

作者简介：

代迅，男，1954年生，四川省自贡市人。1981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85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生，文学硕士，分配到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1993年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比较文论方向博士研究生，1996年毕业，文学博士，返回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1999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文艺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迄今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文艺评论》、《学习与探索》、《外国文学研究》等处发表学术论文及文艺评论100余篇。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新华文摘》、《中国比较文学》等处转载或摘要。

学理论的古今关系便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代迅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写成的。

由于我们过于狭小的专业划分,古与今、中与西往往被割裂开来,即使就中国而论,又被划分为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若干段落,往往是彼此互不相干,特别是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论的研究严重脱节,使得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课题难于得到深入系统的讨论。而代迅由于读博士之前从事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对本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比较熟悉,读博士三年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是中外文学理论比较,我曾要求他们背诵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名篇,这使得他具有能够胜任这个课题的必要知识储备,同时这个课题也发挥了他富于学术敏感性和理论思辨性强的特长。这篇完成于1985年春季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现代转换方面尚属首次,填补了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空白。同时,鉴往可以知来,这篇论文对于探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使之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进而走向世界,都是很有必要的,因而这篇论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多停留在对一些理论范畴、构架、原则的讨论,牵涉的事实比较少,对事实的认真研究就更少,显得比较空洞和理念化。这篇论文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的多数讨论文章不同,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从明清以来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逻辑线索,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梳理,深入地探讨了“失语”的过程及其基本原因,第一次提供了一部中国文论现代转换史,并对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作了前瞻性展望,是

有创造性价值的。

这个课题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都比较大,涉及面广,提出的又是新的研究课题,因而在选题有较大难度。作者以中国古代文论由古入今的现代转换为经,以西方文论由西入中的启动和示范性因素为纬,采取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课题。论文的观点、评价是合乎实际的,也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无时下常见的偏激片面之弊,能做到这一点,我以为很不容易,因为它需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对本世纪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情况有深入的研究,要掌握大量资料,要具备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

这篇学位论文的长处是史论结合,在历史描述的基础上升华出理论观点,而理论观点又与历史的进程紧密结合。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史所留下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对于前苏联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都从转换的成败得失的角度进行了理论探讨,得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当前中国的文论建设是有明显的学术价值的。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部分,极富创见,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中西文论话语中的龃龉与磨合、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等,都新见迭出,是整篇学位论文最富光彩的部分。

这篇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已经先后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东方丛刊》等国内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文学评论》1996年源期,该期“编后记”中评为“这类论说过去并不多见”,“颇有说服力”)、《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龃龉与磨合: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百年行进》(《文学遗产》1995年远期以显著位置刊出)、《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猿期,《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员期“世

纪交汇处的反思——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作了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一九九三年~~ 一期转载,《中国比较文学》~~一九九三年~~ 一期论点摘编)这些成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和好评,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证实了这篇学位论文的学术价值。

代迅考取博士生的时候,家中小孩刚满一岁,在这种情况下来读书,使他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珍惜,在四川大学的三年学习期间非常刻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一九九三年~~ 年的春节,正是我赴台湾讲学的前夕,代迅没有回家,留在学校修改论文。迄今他已经在国内重要核心期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四十~~ 余篇,其中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新华文摘》、《中国比较文学》等处转摘或摘要。看着代迅的成长,作为导师的我感到非常高兴。他现在还这样年轻,我相信他在学术上有着更光明的前途,并期待着他作出更多的成果。

绪论 :世界文论格局 中的中国文论抉择

——

摇摇四世纪即将过去 ,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冉冉升起 ,在这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 ,中国文论何处去 ?这是关系到跨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方向的重大理论课题 ,历史要求我们作出回答。

围绕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解答 ,可以沿着各种不同的思路展开。但是使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 ,中国文论自身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成了当前我国文论界思考和解答这个问题的理论轴心 ,成为人们所热烈关注的学术焦点之一。1995年 10月在陕西西安举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 ,重点讨论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如何继承古代文论传统 ,使我国当代文论形态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1995年 ,《文学评论》特设“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专栏 ,强调中国古代文论应当为我们充分继承 ,集中刊发了国内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其实 ,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而是老问题了。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古代文论如何真正有效地实现“古为今用” ,早在 1976年 缘苑 15月号的《文艺报》上就曾经集中刊发过不少批判继承古代文论遗产的大

量文章,力图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我国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相衔接,以便更加表现出民族性,并且是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提出来,提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1957年10月,毛泽东就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来信要求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意见,在批示中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后“古为今用”便一直成为古代文论研究中的理论方向与指针。1959年,《文史哲》编辑部召开了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座谈会,许多著名学者参加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对古代文论的批判继承和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强调古代文论研究要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服务。1963年10月,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里面提出了著名的“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现在我们之所以又重新提出这个我们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未能加以解决。

历史的发展尽管可能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从来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时期,同样的问题会注入新的历史内容因而会比过去更加深沉和厚重。从国际学术氛围来看,这一问题是在冷战格局结束后,民族主义倾向重新抬头,文化冲突日趋剧烈,全球化过程日渐展开,后殖民主义迅速升温,西方中心论已经破碎的广阔背景下展开的。从国内学术语境来看,这一问题和198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热烈争鸣与讨论,对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文化近百年来的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对近现代特别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经验总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和1990年代以来“国学热”的升温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反映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一百多年后的今

天,中国人要求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追随和模仿状态,以自身的民族特色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要求和理想。季羨林先生近年来就多次撰文,认为东方文化这一自成格局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人类文明的两大成就之一,将在未来世纪发挥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季先生强调东方文化体系的独到性,强调不要用“洋玩意儿”而是用中国式的“土法”来解决自己的文艺理论问题。^①张法、张颐武、王一川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 20 世纪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②

正是在这样广阔的学术背景下,中国文论自身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被重新提了出来并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与讨论,并且提得更为激烈和尖锐,甚至出现了“失语症”的提法。这一提法集中体现在曹顺庆先生《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曹先生把当前文论研究中最突出和最严峻的问题概括为“文论失语症”。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

① 季羨林先生有关著述尚多,此处参阅的是《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 2 期。

②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5年第 1 期。

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论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78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回顾世纪,中国文论没有建立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没有能够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①

这次重提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过去思考“古为今用”的学者们大多局限于古代文论领域,而这一次是包括过去思考“洋为中用”的学者乃至整个中国文论界,结束了过去古代和现当代乃至外国文论各搞一套、互不相关的局面,这不仅意味着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而且预示着将可能会出现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也的确超越了过去而达到了新的理论深度,已经远远逸出了单纯的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的关系问题,还进一步地包括了20世纪乃至近现代中国文论发展的基本评价,中外文论之间的关系,当今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境遇及其原因等一系列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建设跨世纪的中国文论,未来中国文论建设的路子应当怎样走?因而这一次不仅在尖锐性,而且在深刻性上超越了过去,学者们纷纷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明这个问题到今天已经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考,争论很大,但是有这样几点已经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认识:一是中国古代文论在向现代转换

^①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的过程中，与现当代中国文论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断裂；二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缺乏自己的民族特色，模仿西方；三是在本世纪世界文论格局中中国文论没有什么地位，未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四是应当回归传统，重新接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血脉。事实上，把问题讲得如此尖锐的不限于曹顺庆先生，季羨林先生同样如此。季先生深有感触地指出：“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方文艺理论，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崇洋媚西的气氛。”^①香港学者黄维梁先生也说：“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艺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②

这是中国文论在西方。那么，西方文论在中国呢？王逢振先生是这样批评一些中国学者的：“在他们看来，模仿西方出现的风格和技巧似乎是确立‘声望’的一种战略，一些不能这样做的人甚至会感到‘已经落后’。他们认为西方最新的东西便是最好的东西，而不去考虑它们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一时间，似乎谁掌握了西方的新东西，谁就掌握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权，也就最有

① 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4页。

② 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力量。”^①黄宝生先生批评“时下国内有些外国文学研究论文,读着仿佛是外国人在说着半生不熟、似通非通的中国话”,^②事实上,在当今中国文论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在近现代以来就已经形成,那就是“把当今西方文艺思想理论权威化、中心化、经典化。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参照系统,它们构成了理论坐标,而我们只能成为这一坐标轴中的某一个点,我们的一切文艺思想只能用它们的学术话语才能作出价值判断。”“目前中西方文艺学术理论的相互介绍引入出现了极大的反差,中国的新潮学者在崇拜西方理论,而西方学者则在漠视中国理论,几乎在学术的任何方面,都有人在把西方的术语、范畴、概念和模式强加到中国身上。”^③这种极不正常的外文论交流状况,已经引起了国内文论界的普遍不满和日益尖锐的批评。

这就是世界文论格局中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不同境遇。形势是严峻的,也是和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丰厚文学资源的国家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西方国家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强势便是显而易见的外部原因,它必然会对文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就学术范围而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近现代以来学习西方的同时,我们逐渐丧失了自己传统的理论话语和学术规范,和中国文论的固有传统发生了断裂,丧失了中国文论的独特民族个性,因而失去了理论的独创性与原发性,因为创造性离不开个性,缺乏理论个性,就只能是重复、苍白与雷同,是谈不上创造性的。当然我们也不乏积极认真的努力,但总体来看,近现代以来我国文论的独创性与原发性

① 王逢振:《后现代时期的第三世界作家》,《国外文学》1995年第1期。

② 黄宝生:《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③ 刘崇中:《文化碰撞·中国与西方》,《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期。

明显不足,而更多的是对西方文论的追随与模仿。从理论上讲,西方文论输入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参照系,一个全新的理论资源,这是中国文论获得新的重大发展的理论契机,但是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论发展史表明,我们还未能充分地把握这个理论契机,尚未有效地把西方文论转化为自己的血肉。相反,我们自己却往往被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论裹挟而去,而忽略了自己的理论创造,整个文化和文论运作被纳入西方学术话语之中。其实,所谓“失语”,并不是失去中国文论的古老资源,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文论零星和片断的征引始终存在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历来是我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这一学科从本世纪初叶产生至今,其发展速度和成果是惊人的,但是由于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文论话语运作规则,中国本土的古老文论传统始终无法有效地活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之中,这才是“断裂”的真义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失语”,准确的涵义乃是失掉了中国文论固有的话语规则。我们正是在这里失足,这才是全部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学术话语规则的断裂呢,或者说,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与现当代文论话语的规则断裂究竟发生在哪些方向和层面上呢?蒋孔阳先生曾经这样谈到过中国文论,他认为,自近现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不说全部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至少基本上已经取代了。首先,我国近现代一些有成就的文艺理论的大师如像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他们不是坚守传统文艺理论的阵地,而基本上倒向了西方文艺理论。其次,传统文艺理论中的一些名词术语,都改变成西方文艺理论的名词术语了。如‘文心’、‘诗品’等,改变成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其三,对于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也都改用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例如研究《文心雕龙》,一时成为风气,称为‘龙学’,可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大多

都是现代文艺学的方法。最后,总的思维变化尤其明显。……西方思维,一般是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也就是说,从客观对象出发,经过逻辑的分析,以达到体系的建立。中国古代则不然。我们看重感性,不是看重客观对象,而是看重主观的感受;我们看重理性,也不是看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把握,而是看重道与自然,看重物我两忘、天人契合。至于知性,我们更认为是形下之器,不予重视。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是从感性经由知性,以达到理性,而由感性直接跳跃到理性。”“因此,西方文艺理论到中国来,可以说基本上改变了中国文艺理论的面貌”。^① 蒋先生的这番话,对于中国文论话语规则的丧失作了较好概括。

一般地讲,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连续性,已故先辈们的传统始终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思想文化领域的任何创新都必须以先辈们留下的既有思想资料,作为由此出发进一步创新的必要的理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断裂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断裂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近现代之交,中国人自觉和强烈地从情感和理智上否定了中国古代文论,而代之以西方文论,也就是说,在经验和感性的层面上,传统的河床仍然存在,而在理性与逻辑的层面上,中国的本土学术传统则被否定掉了,在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大河里奔涌着的是西方文论的潮头和浪花,这也可以表述为断裂和延续的统一,而断裂大于延续。钱中文先生和张少康先生都曾经就中西文论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指出欧美文学理论有着不间断的连续传统性,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与语言的传统,尽管流派众多,纷争不断,但这些传统是比较稳定的,未有间断。前苏联自十月革命后文学理论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但仍然是

^① 蒋孔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见钱中文、李衍柱主编《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186页。

在 19 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基础上的发展。相反，在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发展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与旧的对垒中被当作了扫除对象，我们力图从西欧、东亚的资本主义强国中获取他们的文化知识来建设自己的新文化，中国文论运作也被纳入其中。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中的种种新的学说，大都来自欧美（包括前苏联），他们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恰如钱中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的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我们跟了别人 100 多年，不知何时有个转机？我们能否建立我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我们能否对我们古代文论中的传统观念、范畴加以改造，使那些表现了文学规律共同性的概念、观念，与现代文论中的概念、观念接轨，从而赋予理论以我国文论自身传统的特色，使我国文学遗产成为新的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①张少康先生则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并认为这是“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②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钱先生和张先生两个人的意见，而是向我们昭示了当前中国文论界正在着力思考的中心内容，并预示着未来中国文论的发展走向。因为，从中外文论发展史的比较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对中国本土文论传统的真正继承，使之真正活在中国当代文论之中，

^① 钱中文、李衍柱主编：《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4—105 页。

^② 张少康：《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5 年第 1 期。

中国当代文论便不可能更进一步地取得重大发展,在世界文论格局中占有自己应得的位置,这实际上是一个学术立足点的重新寻求,目前的中国文论,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和过渡期。

二

阿基米德讲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一个民族文论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一个支点,这就是最为根本的学术立足点。这样一个学术立足点即学术支点的寻找与确立,乃是涉及到中国文论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抉择,具有关键性意义。如果说,近现代以来我们的学术立足点是一切以西方为典范,学习并模仿西方,使我们对西方文论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为未来的中西融合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这一次世纪之交中国文论界对于学术立足点的重新寻找,试图重新立足民族本位,凸显民族文论的个性与原创性,必将更新我们的理论视野,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构成中国跨世纪文论发展的一次重大历史契机。这显示出在经过一百多年中外文论的碰撞与交汇之后,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中国文论已经开始摆脱了盲目摹仿追随西方文论的稚拙状态,开始走向成熟。我们在更高程度上吸纳外来文论的同时,也在更为深刻和自觉的层面上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文论发展的成败得失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这将有可能会使我们的目光变得更为客观和准确一些。于是我们开始了这样一个学术立足点的转移,并进而看到,本世纪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发不出自己声音的现状,不仅是中国文论自身发展的缺陷,同时也是世界文论的缺陷,因为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学大国以平等

姿态，积极有效地参与世界文论前沿的对话与创造，那么世界文论格局本身也是不够完整的。

近年来，全球化与本土化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信息工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客观趋势。但是，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化或是文化一体化，相反，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随着“西方中心论”的破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各种各样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思潮勃然兴起，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全球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更不是某种文化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①置身于21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为我们理解和阐释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论发展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国内学术界普遍兴起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反思。正如不存在同一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或世界文化一样，同样不存在同一的、一体化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论。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着，世界文化或世界文论就只能是各国家民族文学或民族文论的叠加，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建设某种一体化的世界文论，而是共享和充分利用世界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学与文论成果，保持乃至发扬我们民族文论的精华，为世界文论宝库作出我们所应有的独特贡献。人类当然存在着共同的文心与诗心，我们当然应当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论资源，但是，不能把借鉴和创造混为一谈，不能以资源共享来取代民族文论的独特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与独特的民族性格相联系，一个民族的文论始终与独特的民族艺术相联系，任何有生命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

^① 张汝伦：《文化视域中的全球化理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2期。